本版编辑：兰文飞
E-mail：t4@studytimes.cn
Tel：010—62806237

邓小平关于政治生活的主要思想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 戚义明

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的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邓小平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方面，提出过很多重要观点。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他推动党内政治生活不断恢复健全和制度化规范化，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断增强。

主持起草八大党章，强调在执政条件下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提高党员标准

党的八大是我们党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主持修改党章，并于1956年9月16日在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针对党执政后脱离群众的危险、骄傲自满的危险，邓小平突出强调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他指出，要“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监督包括党的监督、群众监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监督，其中，“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监督是最直接的”。加强党内监督，关键在于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发展党内民主。

贯彻民主集中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正确处理上下级组织关系。邓小平既反对上级组织和领导人员“习惯于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对于发扬下级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注意不足”；又反对一些干部“爱好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喜欢党的领导和监督，不尊重中央和上级的决定”，搞分散主义。

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党的各级组织正确实行集体领导。邓小平指出：重大问题要充分酝酿和讨论，反对个人包办，“只有这样，党内的民主生活才能获得真实的保证”；同时，“集体领导，也必须同个人负责相结合”，“在任何一个组织中，不仅需要分工负责，而且需要有人负总责”。

为发展党内民主，党的八大党章还规定：必须注意保护和扩大党员的民主权利、实行各级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等。邓小平强调，“一切发展党内民主的措施都不是为了削弱党的必需的集中，而是为了给它以强大的生气勃勃的基础”。

针对革命胜利后，一些党员干部中出现的精神懈怠、贪图享乐思想和脱离群众、官僚主义作风，邓小平提出要“为提高党员的标准而斗争”。他强调：“不允许有任何在遵守党员义务方面与众不同的老爷”；“一切党员，不管他们的功劳和职位如何，都没有例外”，任何人都没有“特权”。

20世纪60年代初：强调坚持党要管党，注意健全党的生活

20世纪60年代初，面对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局面，党中央总结经验教训，特别是深刻总结党内政治生活方面存在的不足，强调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邓小平突出强调“必须注意健全党的生活”，指出“这是坚持党的优良传统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

坚持民主集中制。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压制批评，党员不敢讲真话、不敢讲实话的不良风气，邓小平指出：“一定要按照传统，按照党章的规定，建立党员与党的正确关系。”要鼓励党员讲心里话，在党的范围内提出批评和意见；领导干部要带头发扬优良传统，善于倾听不同意见。

建立管理和监督干部的经常工作。邓小平指出：“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特别是对领导干部，邓小平强调，除了过支部生活外，还要“重视党委内部的互相监督作用”。领导干部在党委党组内相互交心，作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不只是个人的修养问题，也是一种监督，是党的生活的一种形式”。这就是后来实行的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会制度。

健全基层支部生活，加强经常性工作。邓小平特别强调，支部要按照党章规定，组织党员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否则，“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如果说要变质，那末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个危险的起点”。

拨乱反正时期：重申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强调党内民主制度化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和党的优良传统作风，遭到严重破坏和侵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突出强调，不把党风搞好、恢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党就不能带领全国人民顺利进行现代化建设。

针对党内不敢讲话、不敢讲老实话、弄虚作假的不良风气，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指出：对执政党来说，“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他强调，要“创造民主的条件”，真正在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

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邓小平特别提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他强调：“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要“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伸张正气，打击邪气”。

“文化大革命”中，党的纪律废弛，许多党员各行其是，党员意识、纪律意识淡薄。对此，邓小平提出：“对党员的要求一定要严格”，“要在教育的基础上进行整顿”，看“合不合乎党员的资格，合不合乎党员的条件”。

为全面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使党内政治生活逐步走上正轨，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准则》总结历史经验，对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方面都作了具体规定。其主要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指导作用。

十一届五中全会还讨论党章修改草案，对党员条件规定了严格的要求，进一步明确了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十一届五中全会后，全党以党章修正草案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主要内容，对党员干部进行普遍的教育，党内不正之风逐步得到扭转。

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时期：强调共产党员要增强党性，讲政治、守纪律

按照党的十二大的部署，适应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形势要求，1983年10月，十二届二中全会决定用三年时间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全面整顿。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强调：“整党不能走过场。”要“通过思想教育，增强党性”。他指出：所有共产党员都要“遵守党的章程和纪律，不允许自视特殊，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比党高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更应该严格遵守党章、遵守《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起模范作用”。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发展。邓小平突出强调全党要“讲政治”“守纪律”。他说：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要团结，“一靠理想，二靠纪律”，这是“我们的真正优势”。他还说，“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

讲政治、守纪律，首要的就是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维护和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1988年至1989年间，邓小平多次强调：“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不能“各行其是”，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他还特别指出：“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错误就从这里犯起”。

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对于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进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党风党纪

莫忘苏区群众的奉献

□ 陈瑞生

长征的胜利，是一曲响彻云霄、震撼神州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凯歌。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

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歌颂的。

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的今天，大多数人都会记得，中国工农红军用手和脚、用英勇的战斗、用饥饿和生命编织了地球的红飘带。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的孩子们是怎样在白色恐怖下生存下来的；更不知道，为了抚养和保护这些孩子，苏区人民群众经历了怎样的艰险和苦难。但我和我的伙伴们永远不会忘记苏区人民群众的养育之恩。没有他们的抚养和保护，我们这些幼小的儿童，就会成为红军长征的累赘。如果我们这些幼小的孩子被父母背着踏上长征路，不是饿死就会冻死，或者在战斗中被敌人乱枪打死。长征的险恶环境决定，幼小的孩子是绝不可能跟随父母长途跋涉的。所以，我们的父母只能忍痛割爱，将自己幼小的孩子托付给那些忠诚可靠的贫苦农民抚养。

在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前，被红军留下的孩子是很多的。毛泽东和贺子珍就留下了一儿一女。仅就瑞金我所认识的伙伴就有：林伯渠之子邓苏生、邓子恢之子邓瑞生、古柏之子古忆民、刘伯坚之子刘豹生、王观澜之子王远、贺诚之子贺碎五，等等。

是中央苏区的养父母们，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的危险和生活的艰难困苦，带着我们东家藏西家躲，或者外逃他乡，甚至讨饭度日。他们对待红军的孩子视如己出，甚至比对自己亲生的孩子还要呵护有加。多数孩子都在养母家读了一点书。

如果没有苏区的养父母们对我们的精心呵护和保护，我们这些幼小的儿童是很难活下来的。

就拿我来说，红军长征时，我才刚刚1岁。妈妈彭儒是中央局挑选的可以参加长征的32个女同志之一。临走前，妈妈将我托付给我的奶娘杨长娣继续抚养。奶娘知道，天白了，白狗子回到瑞金肯定要实行报复。如果瑞生这孩子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对得起红军呀？再加之，我的养父宋元注是招兵站负责人，也要参加长征。所以，奶娘觉得难以承担起这个担子。年仅21岁的妈妈恳切地哀求奶娘把我留下继续抚养。妈妈对奶娘说：“大嫂子，请你相信红军一定会回来的。”奶娘对我妈妈说：“彭同志，我们也晓得，红军打仗也是为了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你走吧，孩子就交给我们了。只要我们有口饭吃，孩子就饿不着。我们会把瑞生保护好的。”

红军刚走没有几个月，白狗子就到了瑞金。他们实行白色恐怖，烧光、杀光、砍光。首当其冲的就是迫害红军家属，连我们这些幼小的孩子也不放过。潮陂头是一个宋氏宗族村，而且全村的人都是贫下中农。红军在的时候，几乎都是红军的依靠对象。因此，全村的人都对我很呵护。我吃过好多婶婶的奶，也吃过他们家的饭。白狗子进村后，无论躲到哪一家，都会把我藏起来。这种白色恐怖的日子经过三年，才逐步有所好转。

在我6岁的时候，被“转让”到瑞金大栢地高丘村姓陈的郎中家里做养子。在这个家里，我上了两三年小学。在陈家的十年中，在政治上算是平安无事了。因为这家养父是县参议员，所以，我受到了保护。

1949年8月，瑞金解放了。我们的亲生父母先后派人到瑞金寻找自己的孩子。解放初，我父亲陈正人是江西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他派警卫连龙指导员来接我回南昌。和我一起走的还有刘豹生和李新民。

当我们的亲生父母在解放后把我们接走时，养父母们不计任何回报，也不提任何要求，忍着泪水，把他们含辛茹苦养大的红军仔，送还给我们的亲生父母。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今天，除了我们这些当年红军留下的孩子要牢记苏区养父母的养育之恩，我也希望社会各界人士知道，在苏区曾经有这样一批冒着生命危险而抚养和保护过红军后代的老百姓。他们对红军长征的胜利也作出过不可或缺的奉献。笔者曾在自传体小说《风雨少年》中记载了这一段历史故事。

长征时，还有一支由中央苏区人民群众组成的队伍，也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这就是随红军而行的担架队和挑担子的挑夫们。长征前，红军动员了成千上万当地群众参加这支队伍。光我养母那个村子潮陂头，就有70%的青壮年参加了这支队伍。我认为，他们是不穿军装的红军。除了不直接参加打仗外，他们一路上的负重量比战士还要重。他们同样要爬雪山、过草地，一路上忍饥挨饿，挑着担子，抬着担架，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他们中有人受伤或者牺牲在路上，到陕北时人员已折损大半。潮陂头有很多人参加了长征，可是到1949年8月解放，竟然没有一个人回到自己的故乡。多少个母亲，多少个妻子，整整熬了15年的期盼，却始终没能盼到亲人回来。每当想起这些人的遭遇，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流泪。

长征是伟大的历史事件，值得我们永久的纪念。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苏区人民为长征的胜利所做的巨大奉献。在地球的红飘带上，也有他们血染的风采。



参考与建议

“听言观行察能”防止“带病提拔”

□ 杨云成

最近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下称《意见》），在深化对干部的日常了解方面，提出要“深入了解干部的日常品行和表现，多渠道、多层次、多侧面识别干部”，这对当前正在进行的地方领导班子换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深入了解干部，需要听其言、观其行、察其能。

听其言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听其言，是了解干部的最直接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听述职述廉报告。述职述廉报告既是党组织了解干部基本情况的第一手资料，也是党员干部的一次自我鉴定，能够看出一个干部是否实事求是，是否对组织忠诚老实，更能够在干部对问题的分析中透过现象看本质，看其是否存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良习气。

听纪检监察机关、审计、信访等部门的意见。在对干部的日常了解中，不仅要听取考察对象所在单位的意见，而且根据需要应听取巡视机构、审计机构和其他相关部门的意见。为此，《意见》指出必须建立干部监督信息档案，相关部门应“及时收集整理纪检监察、审计、信访、巡视、督导等执纪监督方面信息和网络舆情反映的干部有关情况”。只有多方面听取意见，对干部的认识才能不停留在感觉和印象上。

听党委领导班子、分管领导和组织部门的意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选人用人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推荐票只能作为用人的重要参考，不能作为用人的唯一依据”。最了解干部德才和实绩的，是领导班子、分管领导和组织部门，他们在推荐干部方面最有发言权。同时，要正确分析和对待票数，在正常情况下，得不到大多数人拥护的人不能提拔。得票情况与党组织掌握情况不一致的，应具体分析、仔细甄别、准确判读。

听广大党员群众的意见。选拔任用干部既要重德才、重实绩，也要重公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业绩在实践，干部名声在民间”。因此，应多到基层干部群众中、多在乡语口碑中了解干部。实际上，重公认与重德才、重实绩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统一于正确的用人导向中。只要我们“让那些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得到褒奖和重用，让那些阳奉阴违、阿谀逢迎、弄虚作假、不干实事、会跑会要的干部没市场、受惩戒”，群众必然满意。

观其行

观其行为动机。对于选人用人而言，要了解一个干部，不仅要看行为本身，更要观其行为动机。只有站在党的立场上，站在为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工作进步、事业发展的立场上为官做事，才是正确的动机。观行为动机，不能靠一两句口号来解决，必须长期看。

观其理想信念。在和平建设时期，考察干部的理想信念虽没有在革命战争年代那样直接，但是仍可检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六个是否”的检验标准，即：是否在重大政治考验面前有政治定力；是否能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勇挑重担；是否能牢固地树立宗旨意识；是否能对工作极端负责；是否能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是否能经得起权力、金钱的诱惑等。这是在新时期检验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是否坚定的标准。

观其对重大问题的分析和处理。“新的历史特点”是我们党全面审视和判断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大势得出的重要判断。“新的历史特点”对党员领导干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科学判断形势、化解风险挑战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观察干部对重大问题的思考，可以看其对问题的见识和见解；观察干部对复杂问题的处理，可以看其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观其对群众的态度和感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因严重脱离群众导致失去政权、人亡政息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他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关心群众疾苦，解决群众困难。在选人用人中，观察干部对待群众的态度，可以看其品质情怀、境界格局。

察其能

古人云，国有三不祥：有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但是，贤与贤之间是有区别的，“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这就要求，我们在考察了解干部中，不仅要知人之长，也要知人之短；既要知人长中之短，也要知人短中之长。否者，必然会知人不深、识人不准，进而导致用人不当、用人失误。

察其能是前提，关键得用其能。一些地方、部门在选人用人上，论资排辈，讲究平衡，不是看谁的能力强、素质高，而是看谁的资历老、工作时间长。用非所长、用非所专，结果必然导致问题积压，工作难以展开。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什么人、用在什么岗位，一定要从工作需要出发，以事择人，不能简单地把职位作为奖励干部的手段”。只有这样才能让大批的优秀干部涌现出来，干部的聪明智慧才能充分释放。

